

从“极右”到“极左”：“四人帮”性质的确认

□ 吴志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界和思想理论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和确认经历了从“极右”到“极左”的显著转变。正如思想史的转换大都表现为鲜明的渐进性而非突变性一样,对“四人帮”性质的定位也经历了复杂而丰富的认识过程。目前党史学界对这一转变的具体历程大都语焉不详。本文拟通过对大量历史材料的梳理与解读,重构并诠释这一拨乱反正时期重要的思想史事件,尤其关注知识分子在此进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展现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大潮中的意义与价值。

粉碎“四人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迅速将其路线确定为“极右”,“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并从12个方面加以论证和解释,从而成为揭批“四人帮”群众运动的重要指导原则和主要目标。此后,官方报刊连篇累牍地从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主观动机、“反革命的罪恶历史”及其“阶级本性”、“腐朽生活”和“反革命政治纲领”等方面,强化论证“四人帮”是“极右派”。知识分子除配合这些方面的揭批外,还基于文化界的具体情况,着重从“四人帮”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事业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妄图打倒一切传统文化遗产的思想以及以“儒法斗争史”为中心内容的影射史学等方面,论述了“四人帮”路线的“极右”性质。这种界定极大地加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极右实质”的传统意识形态理念。

将“四人帮”的性质确定为“极右”,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力图维持和延续“文化大革命”路线以及“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的政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表现出“左”的思想的惯性继承。它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境和“两个凡是”的观念架构中展开其内在逻辑,不仅继承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的政治批判话语、方式和内容,在思维模式和语言结构上均保留着浓厚的“革命大批判”色彩,而且

以很多未经确证乃至完全错误的史实和证据来刚性地比附预设的政治结论和教条,极大地模糊和迟滞了对于历史真相和因由的真正探究与反思,典型地再现了极左历史编纂学的鲜明特征。事实上,对“四人帮”所谓“极右”性质的批判,与“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林彪集团“极右”性质的批判,不仅具有形式上的雷同,而且在精神实质上也极为相似,在一个特殊的问题领域里强化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力,导致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仍然维持了以往的错误结论和认识,使拨乱反正呈现极大的自我矛盾性和不彻底性。

将“四人帮”的性质认定为“极右”,只是孤立地描述出这一政治势力背后的所谓“修正主义”的抽象特征,缺乏足够的事实经验和严谨的逻辑规范的有效支持。这种批判无论在复杂的理论层面还是单纯的宣传实践,都会引发一些实际困难。因此,与“极右”性质的认识相联系,当时政界和理论界也明确意识到“四人帮”至少具有“‘左派’的‘空壳’”,“‘左派’伪装和极右实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到1977年底,思想理论界开始批判“四人帮”具有“凡事‘左’三分”的倾向,并注意到“左”与右的路线具有同样的危害性,提醒人们要“看到‘左’倾与‘四人帮’的假左有一定的联系”,主张恢复既反右又反“左”的原则。部分民间思想者则更早地明确指出,“四人帮”在认识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对象、动力和方法等方面呈现明显的“左”倾特征,因此“当前我们应该反对、应该批判、应该清算的是‘左’倾路线,是极‘左’路线,当前主要危险是‘左’倾危险,应该抓住极‘左’实质进行批判,进行清算。”可惜这些对“四人帮”性质的新思想和新认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未得到广泛的关注、呼应和伸张,但这种批判的悄然转向在1978年得到了加强和延伸。

进入1978年后,在坚持“四人帮”性质为“极右”的认识前提下,政界和理论界将批判重点转向“四人帮”的所谓“假左真右”。同年2月底,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推

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必须彻底“揭露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反动面目。”这对于进一步定位和批判“四人帮”的性质无疑具有较强的统摄性和指导性,思想理论界由此普遍将“四人帮”的“极左”作为“极右实质”的“表现形式”或“策略手段”来加以认识,“既揭它的实质,又批它的极左表现”,“这种极左正是极右实质的表现,正是达到极右目的的手段”。研究者还将“假左真右”视为“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显著特征,并着重探讨和批判了“假左真右”的哲学基础。他们指出,“四人帮”的反动言行全部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和极端猖獗的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他们打着“反对机械唯物论”的旗号,极力夸大主观能动性,颠倒存在和思维的关系,大肆宣扬主观唯心论,自我膨胀至极点,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切为“我”而存在,把“我”的意志视为世界的主宰,奉行“一切根据需要”、“有用就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应该承认,通过对“四人帮”哲学基础的探究,为以后正确理解“四人帮”路线的性质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审视维度。

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将“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的形成缘由归结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中根深蒂固的“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等思维及其卵翼下盛行的极左思潮,认为修正主义分为“左”和右两种,“左”的修正主义比右的修正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害更大,流毒尤甚。因此有研究者主张对“假左真右”的批判要落实到对极左的批判,并敏锐地意识到批判极左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队伍中还有一部分同志,至今没有从极‘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有余毒,心有余悸,前怕狼,后怕虎,因而对拨乱反正的措施认识不清,执行不坚决”,“不批他们的极‘左’,就不能拨乱反正”。思想理论界普遍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及其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空前灾难,以及他们关于反修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谬论,总结和概括出“四人帮”极左行为的具体实例和表现,主张要持续深入地清算“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才是真正要革命的表现”^⑪。在此期间,研究者指出“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还具有浓厚的“左”倾教条主义特征,主张联系林彪集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来批判“四人帮”的极左行为,并开始初步勾勒自反右派斗争以来逐步发展的极左思潮的历史轮廓。所有这些对“四人帮”极左属性的思想认识,尽管服膺于“极右实质”的大框架,但毕竟已逐步接近“四人帮”的真正性质,不啻为认识上的一种进步。

此外,在逐步启动的拨乱反正进程和愈日泛起

的思想解放潮流的促动下,“四人帮”的封建主义性也被逐步揭示出来。^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即指出,“四人帮”在理论和实际工作中设置了诸多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我们要敢于触及,敢于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1978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民主和法制》,再次明确地将“四人帮”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四人帮’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阴魂”,“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发现和确认,不仅比所谓“极右”和“假左真右”的认识深刻得多,并且触及中共党史中某些带有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它不仅关乎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认定和历史定位,而且也决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话语,因为“新时期”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将“文化大革命”等同于“封建主义(复辟)”,进而将自身确定为重新“反封建”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西方启蒙运动发生文化承继性关联的新的历史时期,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的确定显然具有关键节点的重要意义。

由上可见,1978年在理解“四人帮”的性质问题上呈现多种思路,其中既批判“假左真右”又着重批判极左思潮的矛盾样态,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在认知“左”与右的关系问题上的徘徊与惶惑。在此其间渐次形成的一种比较清晰的反“左”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批判意向,亦反映了拨乱反正进程的愈日深入以及1978年在拨乱反正史中的特殊性,为次年最终确定“四人帮”的极左性质铺垫了基础。

三

经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多时间的思想积累,在1979年全面拨乱反正及其带来的民主与自由的政治社会环境的促动下,思想文化界对“四人帮”性质的认识迅速发生了变化。1979年1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金汶《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恶意推行的“左”倾路线》。文章明确指出,应当用实践标准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右倾”和“假左”都不是对林彪、“四人帮”性质的科学概括,“左”倾才是林彪、“四人帮”机会主义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特征。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很多读者认为切中了林彪、“四人帮”路线的要害,“解决了人们普遍关心的大问题”^⑬。同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显扬、王贵秀《论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一文,进一步指出:将“四人

帮”路线的性质错定为“极右”和“假左真右”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明晰地区划作为政治派别的“左”右和作为政治路线的“左”右,将错误路线同提出错误路线的政治派别的动机和错误路线产生的恶果混为一谈,甚至将错误路线等同于反革命阴谋活动。

在此前后,“四人帮”的性质被迅速明确为“极左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或“极左的政治路线”,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旋即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和主流话语。知识分子从思想、政治、组织和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揭露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表现和危害,如再次批判了“四人帮”在教育领域推行的以“两个估计”和由此派生出来的诸多谬论为内容的极左路线^⑭;着重揭露了“四人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史学大肆歪曲和篡改历史,“缺乏起码的史德”,力主进一步“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把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同时批判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在史学界的一些流毒”^⑮;等等。有研究者深入概括了极左路线的特征: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超越客观事物发展的阶段性、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全盘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绝对化思维模式、颠倒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形式主义泛滥等。^⑯还有思想者就极左路线的性质属性明确指出,极左路线是党内的错误路线,是属于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其本质不是对抗的阶级斗争,只能用民主的、讨论说理的方法来处理。^⑰以此为契机,思想理论界在回顾新中国30年历史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构建和反思中共党史上延绵不断的极左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文化谱系。

在此期间,部分思想者进一步指出,“四人帮”极左路线极端夸大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随心所欲地改造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貌似比一切社会主义更加“革命”,其本质是陷绝大多数人民于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划清界限,就必须坚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准则的同时,突破长期以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僵化认识,“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避免大的挫折,少走大的弯路”,“我们已经耽误了多年宝贵的时光,不能再耽误了。然而要想不耽误时间,就必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办事,也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⑱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触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促进了当时整个思想理论界“回到马克思去”思潮的泛起。

在此基础上,思想文化界还普遍认为,极左思潮泛滥并形成极左路线的根本社会历史根源,便在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文化未得以彻底清算,极左思潮与封建主义的关系得到更加深入的理解。有研究者撰文指出,林彪、“四人帮”的本质是一种封建专

制主义的再版,他们的“理想国”是靠小生产作为经济基础、闭关锁国作为条件、“社会主义”作为门面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王国,如此反动的社会专制主义与我国落后的经济、文化和顽固的封建残余思想密切相关,“今天,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专制主义,如果不彻底根除它的思想源流和经济基础,那么遇到适宜的气候,还会长出新的毒瘤。”^⑲这一分析深刻地沟通了极左思想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⑳这种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确认和批判,有效地打破了从“极右”到“极左”这样近似于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有利于深入理解“四人帮”性质乃至当代中国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将极左与封建主义置放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下加以统合式的批判,既反对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意识,也猛烈批判极左政治运动中盛行的对个人意志的非理性专断,有助于呼吁重塑人的自由和解放,积极拓扬科学精神和民主原则。这些文化信念的形成不仅使“反封建”成为一个全民性口号,更为20世纪80年代升华成“新启蒙时代”提供了认识前提,为新的现代性追求确立了奋斗目标和价值规范。

综上所述,1979年对“四人帮”极左性质的确认和批判,从历史肌理上触及极端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初步消解了这一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带来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结构的意义深远的修正和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对毛泽东刚刚逝世之后的中国政治环境又有着巨大的影响”,“已在许多方面发展成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加以净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㉑。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迅速上升为主流话语,成为拨乱反正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生态,为改塑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基础。1979年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无疑具有重要且关键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79年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的一年,极左思想、极左理论已经风雨飘摇,没有多少市场了”^㉒。

四

在“四人帮”性质认定问题上的观念演变和思想论争,实质上表征着不同的政治与文化势力在关于中国未来发展之理论基础问题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对于历史的不同阐释及其力量的消长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底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尽管政治高层一度掌控着对“四人帮”所谓“极右”性质的解释权,但敏锐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其间存在的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症结,开始逐步发现和批判“四人帮”的“左”倾路线,并于1979年最终完成了对“四人帮”极左性质的确认。而对“四人帮”封建主义性质的论述与批判更是一脉相承,始终未曾断裂。正

是在对极左思潮的持续批判的基础上,知识分子形成了具有相对一致立场的文化群体,开启了批判蒙昧思潮和张扬现代理性的又一次启蒙运动。可见,尽管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知识分子群体在推动国家和社会发展尤其在政策制订方面的作用并不十分彰显,但至少在“四人帮”极左性质的发现和确认这一历史事件中,知识分子的确表现出特有的探索精神和质疑勇气。他们在打破僵化思想禁锢和冲决文化禁区的同时,渐次突破和摈弃了长期在一体化思想环境中养成的思维模式,为推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独特的文化贡献。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价值就在于,面临巨大的时代变迁潮流,即使他们不能迅速改变政治高层和整个社会的政治意愿和价值预设,那么他们也应该尽量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质疑那些被设定为不言自明的所谓“公理”,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的普适性,修正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出属于自我的价值判断和问题意识,并积极参与新的政治共识的塑造和发展,从而实现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知识分子很显然应该“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应该“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②3}。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视野来看,在政治势能的强大力量和社会局势的驳杂纷扰面前,知识分子应在坚守主体性的前提下,培育和拓展更为复杂的理论运思能力、更为敏锐的现实把握能力和更为优异的历史洞见能力。同时,知识分子也必须秉承和彰显共同的价值准则与超越意志,否则便永远只能依从某些预设完备的外在标准而随风摇摆。总之,知识分子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知识专业领域,来思考这个世界更加广泛的架构和更加宏远的脉络,“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②4}。

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1976年12月25日)。

朱德发:《“左派”的“空壳”极右的实质——剥开江青“正确路线的代表”、“文化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画皮》,《山东师院学报》1976年第6期。

孙旭培:《“四人帮”的假左派伪装和极右实质》,《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4日。

王永安:《斥“凡事‘左’三分”》,《人民日报》1977年11月5日。

嵇思:《彻底剥掉“四人帮”的假左派伪装》,《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4日。

《抓住实质,分清是非》(1977年4月)。

李洪林:《揭批“四人帮”是一场历史性大决战》,《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柳文超:《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篡改——批判“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动哲学基础》,《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岳力:《“四人帮”假左真右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大敌》,《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宋振庭:《论“四人帮”的出现和灭亡》,《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①石竹:《评所谓“‘左’比右好”》,《光明日报》1978年6月9日。

②事实上,黎澍在1977年就撰文指出,“四人帮”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极端保守、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这一势力及其背后的思潮与中国革命未彻底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有根本联系(黎澍:《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这一认识极大地超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的历史语境,具有极强的历史洞悉力。

③“读者来信”,《光明日报》1979年2月17日。

④黄水桥:《评“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推行的极左路线》,《昆明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⑤姜沛南:《评“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产物——〈五卅运动〉》,《社会科学》1979年第4期。

⑥张明:《极左路线的特征及其根源》,《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5期。

⑦《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几个问题》(1979年6月)。

⑧李洪林:《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人民日报》1979年5月9日。

⑨金樱:《评林彪、“四人帮”的社会专制主义》,《光明日报》1979年2月11日。

⑩厉以宁曾就此指出:“极左的东西总是同封建的东西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最革命的词藻庇护着最黑暗的封建糟粕。社会主义本身是优越的,但践踏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由于他们惯于用革命的口号替自己身上抹上一层圣油,于是本来是封建的东西却变成了‘社会主义的’。”见厉以宁著:《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4页。

⑪【美】威廉·A·约瑟夫著,夏军等译:《极左思潮与中国(1958—1981)》,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279页。

⑫《分段解决毛泽东问题——回顾三年来解决毛泽东问题的过程及展望》(1980年3月6日)。

⑬【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25页。

⑭【英】齐格蒙·鲍曼著,洪涛译:《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徐香花】